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增订版

郭世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增订版

郭世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增订版/郭世佑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808-6

- I. ①晚…
- II. ①郭…
-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 IV. ①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484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增订版)
郭世佑 著
Wanqing Zhengzhi Geming Xin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9.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7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世佑同志的新作《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即将付梓，嘱我写一篇序。这本书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论析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我对此缺乏深入研究，所以迟迟未敢应命。但世佑同志再三催促，坚辞未免不恭，只好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自己对有关“近代化”问题的不成熟看法，聊以塞责。

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本书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问题，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这自然是毫不奇怪的。当全国人民都在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力拼搏的时候，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把自己的学术视野，较多地聚焦于以往走过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历程，或者探索今日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渊源，或者从中寻找历史依据，或者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获取历史的借鉴。

但是，“近代化”是一个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对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近代化的目标、任务、内容、途径等，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近几年来，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存在着对立和分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仅仅从学理这个角度来探究，对“近代化”的不同理解，恐怕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

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中，叙述了“美国当今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汉学界）在对近代史研究上，经历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文章说：“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当时，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



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这种看法从 80 年代中期，便开始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有的认为，“虽然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未成为现代社会，换言之，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有的则更进一步强调，“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总之，“论者们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发展的障碍”。

我们用这么多的篇幅引用德里克教授的文章，是因为正如德里克教授所说：“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情况确实是如此。

近几年来，在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几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一套相当有体系的所谓“新见解”，这些看法都是在“中国近代化”的大题目下展开的，或者也可以叫做“近代化范式”吧。这些看法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征服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的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有的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传统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观点，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在这些作者看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封建中国的“超稳定系统”，“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



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还有的说：“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的使命，是对中国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政策的一种必然回应，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总之，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第二，封建主义的统治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

一些论著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难得的机遇，可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走向近代化的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此同时，一大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直到慈禧太后，纷纷被戴上“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之类的桂冠。当然，对所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采取简单化的一笔骂倒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确实在历史上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是，有的文章却并不是对这些人物作细致的分析，而是一律把他们称之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味讴歌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甚至认为“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还有的论著把袁世凯推行的政策评价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称赞他的教育思想“是前无古人的”，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都归因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开明”统治的结果；把徐世昌吹捧为“推翻旧世界的先行者”，像这样一些观点，可以说相当流行。

第三，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既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起了那样积极的作用，既

然封建主义能够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那么，逻辑的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是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来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的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提醒大家，应该充分注意“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并力主把“革命神圣”这个“大案”“翻一翻”。

如果把这一节所引的某些中国学者的看法，同上一节所引德里克教授转述的某些美国汉学家的看法对照一下，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联想。

我并不想对上面所引观点的是非对错作分析和评论（在另外的地方我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想谈一下这些观点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导引出来的。

并不是一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就必然会得出上面这些结论。这些看法，如果从学术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以为主要是对“中国近代化”片面理解或片面解释的结果。

在有些作者看来，“中国近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的近代化，或曰工业化；而经济的近代化，又主要是指办了多少个工厂，修了多少公里铁路，开了多少个矿，即使扩展一点，也主要是考虑派了多少个留学生，办了多少个新式学堂等。如果以这个作为唯一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准，那么，上面一些观点就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了。

例如，首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作用就应当肯定。因为正如胡绳同志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再版序言中指出的，“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什么别的力量，就是帝国主义”。正是帝国主义首先在中国开办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但胡绳同志立即强调指出：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是否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



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根据大量史实，归纳了帝国主义在 10 个方面侵略中国和残酷地统治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其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阻碍中国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

其次，按照前面那种对“中国近代化”的片面理解，必然要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之于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不掌握或大或小统治权力的人，除了极少数民族资本家外，是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至于革命者或现存统治秩序的叛逆者，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上，哪里有可能去开工厂、修铁路呢？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经下决心修 20 万公里铁路，但政权不在自己手里，没多久就搞不下去了。

问题是，“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无疑是对的。但资本主义化决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拿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一般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进程：首先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种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形成和产生；新阶级力量的壮大，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思想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相当时期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政权。于是，资产阶级又反过来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会有很多不同，但大体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复杂的历程。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同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种种较量和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常常需要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

中国的情况，要更加特殊一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起码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情况下开始的；其次，它又是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用血与火的手段，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丧失国家民族的独立地位的情况下开始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由于没有经过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的重大冲击，又由于得到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的一面），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地起着阻遏历史前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力图使国家富强起来），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迫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和第一位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那些最杰出、最有远见、最具有爱国情怀的才俊之士，都宁肯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投入到改革和革命的壮丽事业中去的缘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觉得因为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而去否定或贬抑改革和改革家、革命和革命者，是那样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它远离历史的真实，缺乏科学和理性。

事实上，在谈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历史事实证明，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事业前进一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近代化程度也就大大提高一步。待到彻底争得了民族独立，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中国人民也就创造了一个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和可能。

上面这些看法，是不是能够成立，是不是能够为多数读者所接受或赞同，从根本上来说，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世佑同志的这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并不是专门从理论上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的，但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大量生动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中国近代化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些重大



的问题，我们在总的倾向上是一致的。当然，作为一本专门著作，比起我在这里所作的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论，要深入得多，也细致得多了。

世佑同志出版这部学术新著，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时下的学术风气或社会风气，“捧”风颇盛。有青年吹捧老者的，也有老人吹捧年轻人的，当然还有同辈之间的相互吹捧和自我吹捧的。捧来捧去，结果是“学者”泛滥，“权威”遍地，“大师”贬值，“明星”成灾。我以为，这对于真正意义的学术繁荣，非徒无益，抑且有害。正因为如此，我不大愿意对本书的优点作详细的评论和介绍，而宁肯把评判的权力留给有兴趣并有耐心读完这本著作的读者们。但我确实知道，世佑同志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在并不十分优越的学术条件下，作了许多努力，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不乏颇具创见之处，尽管并非他的所有看法我都是赞同的。我衷心祝愿世佑同志保持勤奋治学和勇于创新的好学风，在史学园地里继续辛勤耕作，以便争取更多更好的收获。

李文海

1997年3月1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太平天国：旧式“汤武革命”而非近代政治革命	22
一、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与太平天国 领导者的个人缺陷	22
二、从“江永女书”看江永劳动妇女响应 太平天国起义者的真实态度	43
三、动态的历史过程与辩证的历史分析	49
第二章 逼出来的“新政”：政治革命的一个背景	58
一、19 世纪国家振兴良机的丧失	58
二、“无形之瓜分”	73
三、“新政”的开端	83
四、新气象与新问题	90
第三章 来自“中等社会”的奔走呼号	113
一、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	116
二、1903 年的留日学生与 1905 年的中国同盟会	145
三、关于政治革命的笔战真相	174
第四章 “新政”的深化与危机	213
一、软硬夹击中的承诺	213
二、预备立宪面面观	226
三、“新政”补议	236
第五章 武昌起义与政治革命的转机	258
一、同盟会的组织分裂与中部总会	258
二、刘复基——一个被遗忘的武昌起义主要筹划者	268
三、鄂湘之别：静候黎元洪与速杀黄忠浩	287
四、反满大合唱与政治革命的契机	301

五、共时性的“三角戏”	313
第六章 评说与沉思	322
一、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322
二、阶级基础：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339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	361
四、“规律”及其他	380
 参考书目举要	389
附录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394
附录二 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	406
附录三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	417
附录四 郭世佑论著代表作要目（1981—2008）	435
后记	441
增订版后记	451



绪 论

也许因为劳苦大众诉诸武力的抗争不仅体现着人类的求生本能和永恒正义，而且显示着民族的精神和力量，也许因为中国现代革命巨人毛泽东操着湘潭口音震撼全球的那一声庄严宣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劳苦大众不屈不挠奋起反抗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常把“革命”当作暴力反抗即武器批判的同义词，“革命”一词的普及率与使用率在赤县神州的思想交流与文化传播中首屈一指。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及至1964年，他还提醒侄儿毛远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②

且不说毛泽东对侄儿说的这一番话同他两年之后所发起的那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运动之间有何内在的思想联系，但可以肯定，毛泽东主要是从事物的变革方式（即暴力）与政权所有者的变换（事物变革的一个结果）着眼，来把握和强调“革命”一词的内涵的。他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同俄国“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学说比较接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1964年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



近，影响及于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

在列宁看来，“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①。他还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②

列宁在这里尽管并没有忽视从事物变革的内容（即通过革命实现政权的阶级转换，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阐释革命的意义，但他强调得更多的还是事物变革的形式即暴力，并且把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观点”。

毫无疑问，面对暴力斗争之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常将事物变革的形式即暴力当作“革命”的基本内涵来阐释。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③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也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④ 进而，他描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美好前景。正如列宁在《社会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所总结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⑤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总是把暴力反抗视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也并非总是把暴力反抗当作“革命”的主要内容，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和无产阶级暴力反抗的实际经验与教训，予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例如，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之后便指出：“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

① 《列宁选集》，2版，第3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同上书，2版，第1卷，6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⑤ 《列宁选集》，2版，第1卷，616页。



统治。……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①

再过两年，恩格斯一边强调“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一边又提醒到：“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引者），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曾把英国资产阶级对“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的印度农村公社的破坏看成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面对英国资产阶级在卑鄙的私利动机驱使下所造成的这种社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提议“同歌德一起高唱”。这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以印度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容为依据，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造成这种变革的方式即英国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暴力侵略为依据来谈论“革命”和“社会革命”的。

在马克思的革命学说里，“社会革命”的思想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还有待专题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人以此为依据，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邪恶行为叫好，鼓吹“侵略有功”，那是很不妥当的。正如马克思同时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贫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449～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 同上书，中文1版，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7～68页。

④ 同上书，73页。